

## 【理论与方法】

【原刊编者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传统领域,中国抗战史研究在新世纪以来的20多年中取得了具有时代性的学术进步,在研究理念的创新、研究范畴的延展、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研究力量的整合等诸多方面都可圈可点,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历史学科的学术化进展。2019年底出版的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个初步总结。但客观而言,中国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水平不高,存在着学术史评析不够、思想解释和理论总结不足、发展思路模糊、问题意识淡薄、学术创新缓慢等一系列问题与不足,制约着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此学术背景下,如何继续推动、深化和创新抗战史研究尤其是中共抗战史研究,就成为整个历史学界亟须认真思量 and 细致规划的一个问题。鉴于此,本刊开设“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栏目,诚挚期盼广大历史研究者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本期先行推出几位学者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知识体系· “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一)

## 关于抗日战争整体史的叙事问题

李金铮

【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21.5.23~27

整体史或总体史是历史研究的根本目标。无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还是比较短时的抗日战争史,一切具体的、片段的研究,最终都是为了写出一部大家比较信服的整体史,也就是内容全面、主线清晰、结构平衡、客观反映的通史著作。当然,历史不可能得到全部还原,一切历史书写都是有选择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书写都是如此。由于各种原因,暂时撇开某些历史是无法避免,也是无须苛责的,但无论如何编纂,对关键问题、核心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对所呈现的内容应最大限度地追求真实可信、基本一致<sup>①</sup>。就抗日战争史而言,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颇为优秀的通论性著作,较具代表性的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军科版”),王建朗、曾景忠著《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近代通

史》第9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江苏版”),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四卷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年,以下简称“化工版”),等等<sup>②</sup>。各位作者、编者都是笔者十分尊敬的前辈,几部大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其推动抗战史研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笔者不拟对此再作赘言,而是在学习和领会的基础上,仅在几个关键问题、核心问题上提出一些思考和改进的意见(与“挑错”不是一个概念),或许有益于抗日战争整体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 一、如何呈现支撑抗战的社会基础性力量

历史著作更多是通过事件呈现的,事件最能反映历史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进程,因而有其合理性。但历史又是由多方面的合力所形成的,在事件之外,还有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性力量在发挥作用。正如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事件的历史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的强力运动所掀起的波涛。我们不会注意历史的潜流——那些活水。这些潜流的真正意义,只有当人们观察到它们在长时间的作用时才会显现,“惊天动地的事件常常发生在一瞬间,但它们不过是一些更大的命运的表征。而且只有根据这些命运,事件才能得到解释”。<sup>③</sup>抗日

战争是一场总体战,除了事件性较强的军事、政治、外交的历史外,还有支撑这些领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基础性力量,而这些力量往往与悠久的历史传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显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不可能上战场的,而是在战争背景和战争进程中延续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共同构成了抗日战争的全貌。

应该说,如同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一样,改革开放以来的抗战史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内容“一统天下”的基本格局,增加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内容,这是历史书写的一个进步。不过,这些内容从总体上讲仍然是点缀式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叙事结构,缺乏历史的深沉感和厚重感。以1937年至1945年的全面抗战时期而言,军科版共27章、91节、272目,其中反映国共抗日的经济和文化只有7节、14目,占总节、总目的7.7%、5.1%,没有社会条目;江苏版共13章、53节,经济、文化、教育共7节,占总节的13.2%,也无社会条目,比前一著作的比重有所增加;化工版共56章、220目,经济只有6目,占总目的2.7%,且都与国民政府有关,几无文化、社会条目。尽管政治、军事、外交占更多篇幅是可以理解的,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基础面如此之小,与实际的重要性相比,实在是太不相称了。近年来,有研究者常常指出,抗战史研究中的军事史研究太过薄弱了,抗日战争史常常没有“战争”。不过,从通史类著作而言,显然不是如此。这一说法的出现,大概与今天不像过去有较多学者从事军事史研究有关,但从绝对数量而言,是否比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还弱,恐怕是可以商量的。当然也可以肯定地讲,抗战军事史研究尚有继续探讨的极大空间。<sup>④</sup>

还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经济、文化与社会的阐述,不能仅限于现象描述,更要进一步挖掘其与抗战前的变化,尤其是与中国历史传统的联系。这里仅以农业经济为例,作出一些简略说明。

粮食之于抗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为了保证粮食供给、提高粮食产量,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在农作物结构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即减少非必需经济作物种植,增加粮食作物种植比例,提高自给自足程度。在国统区,除了开垦荒地、

禁止鸦片种植之外,非必需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以四川的烟叶种植面积为例,1936年为182.1万亩,1937年降至165.1万亩,1938年更降至140.3万亩,以后至1945年也多在140万亩左右。花生种植也有一定减少,1931年至1937年为241.6万亩,1938年至1947年降至218.6万亩。<sup>⑤</sup>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对经济作物种植减少的调整就更为明显。如果说棉花种植在国统区仍是受到鼓励的,但在根据地建立初期立足未稳之际,则是限制的,因为抗战前棉花产品大部分出口至日美等国<sup>⑥</sup>,抗战爆发后则有资敌之危险。另外,减少植棉也是为了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所以,冀中地区,“适合植棉,但不能提倡种棉”;冀南地区,“棉花顶多不能超过所有地20%,如超过者,斟酌超过亩数,予以没收超过亩数之产量之一半或全部”。抗战前的1936年,棉花占河北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2%。1944年,晋察冀北岳区9个县(多属河北县份)的棉花种植,仅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9%。<sup>⑦</sup>显然,农作物结构调整是农业生产一个很大的经济变化,对抗战期间的粮食支持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重要现象却被以往的抗战史著作忽视了。军科版和化工版对此未曾提及,江苏版稍有涉及,但也仅提到“为保证战时供给,国民政府规定减种烟草等非必需品,改种粮食作物”等数百字(第156页)。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还要进一步认识到,近代以来,经济作物的种植、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愈益成为社会进步的反映,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落后的标志。但到了抗战这样一个特殊的内外交流不畅和受到日本封锁的历史时期,恰恰是回归这样一个经济传统(包括手工业),较大限度地减少对外依赖,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经济力量。这一论断,更是以往抗战史著作鲜见的。

而要想改变上述结构失衡和历史纵深感薄弱的叙事困境,历史学界就不仅要增强基础社会力量与抗战密切关系的认识,更要对此展开深入研究。

## 二、如何呈现抗战史的另一条线索——国共斗争和磨擦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合作抗日当然是主流,但相互之间的斗争和磨擦也不可忽视,它们同

样是国共之间“共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斗争和磨擦是抗战史的另一条线索,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抗战进程,直至影响和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命运。

此处仅以百团大战为例,对两党之间的斗争和磨擦作出说明。在1940年8月至12月百团大战期间,战役在国共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历史记录中都出现不多<sup>⑧</sup>。在权威文献《毛泽东年谱》中,仅出现过两处与毛泽东有关的记录。一处是9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先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作出说明,其次对几个具体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关于百团大战,他指出,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另一次是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对百团大战的估计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是一次“反扫荡的战役反攻”,不是战略反攻,要有防备顽固分子背后进攻的部署。<sup>⑨</sup>另外的记录还显示,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江南新四军与国民党军的矛盾和冲突。再看蒋介石,1940年8月至1940年12月的《蒋介石日记》涉及共产党的内容有46天,只有两天记载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信息。一次是8月29日:“1.八路军截断山西各铁路之行动,对敌军精神与计划上必受一打击;2.中共对抗战之态度,表示积极。”另一次是8月31日:“第八路军袭击正太与同蒲各路,予敌以相当之威胁,此实抗战以来中共第一次之努力也。”其余所记,基本上为国共之间的不睦,尤其是新四军北移问题。由上可见,两党之间的斗争和磨擦是不可回避的现象,在以抗日作战为叙述主体的同时,应给予足够的篇幅来加以呈现。

然而,抗战史著作对此叙述较少,且不同著作呈现的篇幅也有较大差别。相比而言,军科版对国共斗争和磨擦的叙述较多,但也只有四节内容有所涉及或专门叙述,包括抗战初期的反磨擦、反投降和反分裂斗争,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而江苏版未设一个专节反映国共斗争和磨擦,只有两节有所涉及:一是“抗战初期的对日作战”一章“敌后游击战”一节指出,“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军与中共领导的八

路军之间发生矛盾和磨擦,最早出现在河北省地区”,并有不到300字的简略介绍;二是“抗战中期的对日作战”一章“敌后抗日战场”一节有一目“皖南事变及其后新四军的进一步发展”指出,“1941年1月6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之间最严重的军事磨擦事件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对皖南事变有较多的叙述。化工版也未设专节叙述国共的斗争和磨擦,只有两节有所涉及:一是“新四军、八路军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一节指出,“由于国民党奉行‘溶共、限共、反共’政策,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分裂、倒退逆流,国共磨擦加剧。据守苏北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在韩德勤威胁下,由中立转向军事反共”,同样也有不到300字的简略介绍;二是“国民政府苏鲁游击区”一节指出,“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坚持反共,蓄意挑起磨擦,苏鲁战区国内、共两党两军关系恶化”,对秦启荣、韩德勤、李品仙等部与新四军的磨擦进行了数百字的描述。但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最有影响的磨擦事件,该著则没有提到。由上可见,同为抗战史著作,对同一现象的叙述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反映了史实构架的另一困境。

其实,国共斗争和磨擦的现象恰恰反映了中国抗战的复杂、艰难和曲折,这一真实的历史镜像并不会降低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因此,一方面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应该尽可能统一构架、统一表述。

### 三、如何呈现国共两党的敌后抗战

国民党正面战场之外,还有共产党敌后战场和国民党的敌后战场。在敌后战场,主要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国民党虽打过游击战,但没有根据地,甚至由此导致国共之间的磨擦。基于此,抗战史著作对敌后抗战应主要凸显中共根据地,但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以上几部著作,对国共敌后游击战的呈现同样有着较大的不同。

首先看中共敌后抗战。军科版对中共敌后抗战的阐述最为突出、详尽,涉及16章、41节、101目,分别占总数的59.3%、45.1%、37.1%。江苏版所占比例则差别较大,有关者仅3章、3节,分别占总数的23.1%、5%。具体言之,“抗日战争初期的对日作战”

一章共6节,有5节为国民党战场,1节为共产党敌后战场;“抗日战争中期的对日作战”一章共5节,有4节为国民党战场,1节为共产党敌后战场;“抗日战争中期的对日作战”共8节,有7节为国民党战场,1节为共产党敌后战场(不完全,包括“国民政府军的衰微”)。化工版对中共抗战的叙述也较多,涉及21章、85目,分别占总数的37.5%、38.6%,和军科版比较接近。

与此相关,如果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基本著作的定位,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由此,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sup>⑩</sup>。那么,抗战史著作能否与此相呼应,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

其次看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军科版仅设一节“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叙述1938年11月湖南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相关部署,并简略介绍了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晋绥战区、冀察战区、鲁苏战区的国民党部队及其抗战的衰败过程,基本上是否定的。江苏版给予了较多篇幅,分为抗战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以三章篇幅进行了相关阐述。抗战初期“敌后游击战”一节的“华北敌后各地抗日游击武装纷起”一目,描述了1938年11月南岳会议之前的国民党军游击战,国民政府军撤退时留有少量部队在敌后游击,如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民训处主任张荫梧发起组织河北民团,宋哲元委任原察北保安司令孙殿英为冀北民军司令,将河北两个保安旅改编为第181师石友三部并留冀南游击。抗战中期“敌后抗日战场”一节的“国民政府军的敌后游击战”一目,描述了南岳会议后至1941年冀察战区、鲁苏战区,第五战区,第一、二战区,第三战区,第四、七战区等方面的游击战。抗战后期“敌后战场中共军队的发展和国民政府军的衰微”一节的“国民政府军的敌后游击战”一目,阐述了1942年至1944年原冀察战区部队鲁西游击区、第一战区河南地区、第二战区、第八战区、鲁苏战区、第五战区大

别山游击根据地的游击战。以上各阶段尽管揭露了国民党军游击战的失利乃至退出,但对其战绩也给予了肯定。与上著体例不同,化工版专门设立一个部分“国民政府的敌后战区”,对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分为5章、12目,包括敌后游击战方针的确立及举措,第二战区的晋绥游击区,冀察、苏鲁游击区,第五战区的鄂豫皖边游击基地以及其他战区的游击作战等。对游击战的战绩和失败,也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总之,即便以最优秀的抗战通史著作来看,无论内容、主线、结构还是客观反映上,都还存在着叙述上的困境。尽管不同著作各有取舍,无须也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模式,但在关键问题、核心问题上,总要有历史学界认可或基本认可的统一表述。然而,不得不说,挑出问题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从破到立,何其难也!

最后,笔者还想补充一句,抗日战争是一场异常残酷的战争,胜负固然重要,后人无理由为抗战的胜利高唱赞歌,但拿出更多的篇幅来揭露侵略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防止人类悲剧的重演,也许是更大的责任。

#### 注释:

①历史研究具有服务现实的功能,但必须尽可能以真实的历史服务现实,绝不能为了迎合现实而随意剪裁历史、遮蔽历史、曲解历史,此为最起码的底线。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②另外,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并非通史性而是专题性著作,包括局部抗战、战时军事、战时政治、战时军队、战时外交、战时经济与社会、伪政权与沦陷区、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等问题。

③[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④战争史无疑是军事史的核心,但军事史并不总是战争史,譬如军队的日常生活、军队的生产经营是不是军事史,便值得进一步考量。

⑤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5、217页。

⑥参见李金铮:《延续与渐变:近代冀中定县农业生产及其动力》,《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⑦参见牛建立：《华北根据地农业建设研究(1937-1949)》，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5—291页。不过，当根据地获得稳定和发展并能够控制棉花的出口时，有的地区又鼓励植棉，同样是为了自给自足的需要。有的地区棉产量较大，除了自给还有剩余，就出口到日伪势力控制较弱的非产棉区，供那里的民众消费，既不资敌，又使棉农获得收益。

⑧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的《八路军·文献》来看，关于百团大战的电报、指示，主要是朱德、彭德怀、左权发出的，毛泽东几乎没有。参见《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531—597页。

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07—208页。

⑩《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207.262—263页。

## 倾听静默的声音

黄道炫

【作者简介】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21.5.27~31

抗日战争是中国充满荣光的历史。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四强”中的一员，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一票否决权，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被欺凌角色由此改观。这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抗战时期还是中国人民遭受凌辱和苦难的历史，在日军侵略的铁蹄下，大批无辜民众罹难，幸存的民众也不得不承受流离失所的打击。这些辗转于战火硝烟下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痛苦和命运，虽然在大历史的书写中从来没有缺位，但是由于历史材料的留存、历史书写的习惯及学术兴奋点等因素，他们被关注的程度远远不够，多数民众成为历史书写中的失声者。

民众在历史创造活动中人多势众，理论上说，应该成为历史的主角。但是民众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角，却有着许多不得不克服的困难。且不论观念上的原因，现实中也有许多困难。历史书写必须依靠文本和材料，这是历史这门学科无法摆脱的命运。对于过去发生过的一切，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布洛赫所言：“哪名历史学家不曾梦想和尤利西斯一样，可以喂养鬼魂以求问于他们？但现在不是招魂术的时

代，我们已经没有别的机器去回溯时间，除了开动大脑，利用过去时代留下的资料。”<sup>⑩</sup>可是，过往的历史材料和过往的时代一样，通常都会把视线集中于那些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事件身上，越早的记载越是如此。民众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弱小一方，他们的声音常被忽视。即便留下了一些声音，也多经过转述和加工，里面传递的信息真假参半，很难分辨到底是转述者的想法还是民众本身的意愿。在历史上，由于发声空间及书写能力的限制，多数民众都没有记录自己所思所想和生活状况的可能，他们在社会政治大环境的挤压下，被技术性地忽视，这种忽视甚至看起来天经地义。材料和文本是历史研究者进入历史不可或缺的工具，当民众的声音无法提供给历史研究者时，即便历史研究者想为民众发声，也可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抗战时期，中国经济文化落后，民众发声的机会非常有限。战争状态下，时局动荡，社会混乱，人们颠沛流离，关于民众生活的记录更是难得。不过，战争也带来一些变化，由于异族直接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把整个中国都拖入持久经年的战争状态，予民众以前所未有的刺激，民众开始“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另外，经历近代以来的外力压迫，尤其经过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中国人的自我觉醒和民族觉醒都不断高涨。教育文化的发展及现代传播工具的诞生，也给民众发声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持。如果说，之前民众是历史的被动参与者，抗战及之后，民众越来越主动参与到历史的创造中，尽管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但是毕竟让历史研究者有了更多倾听的可能。

让民众在历史书写中发出声音，既是历史研究者应有的关怀，也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克服的严峻挑战。要向着这一方向努力，当然首先还是需要尽可能地发掘更多面向普通民众的历史材料。很多时候，视野决定结果。如果眼睛向下，不是把视线仅仅停留于官方文献、历史档案、新闻报道等习见的材料当中，更多注意民间文献，包括日记、笔记、书信、照片等一些私人记录，可能会大大丰富材料的来源，使民众生活的材料不断浮现。其中，调查材料及各地的争讼材料，尤其值得高度注意。它们往往产生于

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中可以窥探民众心理、风俗、婚姻、买卖、日常交往等观念和生活具象。尤其争讼材料以特有的生产方式,让无法或者无缘留下文字记录的普通人在争讼中存留下文字记录,得以在历史上发声。各种各样的案例,由于当事人的描述,呈现民众生活的千姿百态。争讼材料还涉及利益和是非之争,特别细致、具体,需要展现当事双方乃至各方的看法和行为,且以辩驳和追问的形式出现,精确举证、层层深入,为大多数其他材料所不及。

争讼材料当然也不是没有局限,争讼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争讼中的许多话语及其呈现的观念、行为常常是社会中的异态。集中使用这些材料时,由于其密集出现,无论研究者和读者,都有可能认“异”为“常”,由此对当年的社会运行作出偏颇的判断,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不过,如果研究者和读者只是希望从中了解民众社会生活的景象,而不据此对当年社会运行作出全景式的判断,这样的陷阱完全可以避免。

除了尽可能发现更多能让民众发声的材料,历史研究者还可以做的是通过想象和共情,让历史上的民众通过研究者发出声音。多数人都会承认,人类的理性和情感经由社会生活后天习得,共有的环境、观念、文化塑造着人类,其间虽有变化,文化传统却得以代代相传。当代神经科学的研究证实,“在神经层面,诚如休谟所说,我们的心灵是‘他人心灵的镜子’”<sup>②</sup>。正是经由此,我们可以在共有的生理结构和文化体系中理解和认知前人。历史研究可以依赖的文本总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文本间沟通联系、厘清线索、建立逻辑,是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责任,而依赖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即为想象和共情。想象和共情可以帮助历史研究者回溯过去,也可以帮助历史研究者在无法得到直接材料时,通过蛛丝马迹获得经验,感知那些无法发声的民众的经历、痛苦、期待,重建他们的生活景象和心灵世界。即便这样做有些风险,历史研究者似乎也无法回避这样的风险,毕竟历史不能只有掌握话语权的那些人的声音。

具体到抗战史研究,如果更多把眼光聚焦于民众之中,抗战中付出巨大牺牲和奉献的民众就有可能更多地浮出水面。他们是一群人,又是一个一个

的个体,共同书写着抗战这部大的历史。如果存着这样的想法,或许抗战史研究可以投入更大精力的领域还有很多。除了战争中最为人关注的军事和政治,起码还有如下一些方面或领域有理由得到更多重视。

一是流亡迁徙史。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占据中国大片领土,中国人民经历了一个由沿海向内地、由东向西大迁徙、大流亡的过程。有研究认为,抗战时期中国人口的迁移数量当在1亿以上<sup>③</sup>。这些迁移人口,有政府组织的西迁,有政府参与组织的厂矿和学校迁移,还有一些难民的内迁。难民的迁移比较复杂。有战争逼近后,城市居民向老家乡居地区的流动,中产以上民众向后方地区的流动,也有城乡之间、乡村之间短暂的避祸流动。

西迁的重头是大批学校的内迁,内迁的教师和学生构成西迁居民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据1938年5月的一个不完全统计,西迁人口中的文化教育者即占到55%以上<sup>④</sup>。所谓“弦歌不辍”,指的就是文化人的内迁。众多来自沿海和发达地区的居民,为内地省份带来了较先进的技术、较高的文化水平、相对文明的生活方式,对内地形成一定冲击,相当一部分内地省份由此开始逐渐走上近代化的轨道。这是现有研究揭示较多的内容。

作为研究者,不应该忘记的还有中国人民在抗战大迁徙中遭受的巨大苦难,大批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不少婴幼儿、妇女和老人因疾病、饥饿而被遗弃或死亡。据徐永昌记载,1937年12月5日,蒋介石曾于中山陵附近见一携妻带子之难民“凄惶路旁,询之乃悉敌攻苏州时逃出,现中山门拒难民入城。复询其将何止,则茫然大恸,虽予以资斧而不能止其怨苦,归来频语,这是谁的罪?”<sup>⑤</sup>蒋之所见,只是九牛一毛。

大迁徙带来很多冲击和变化。比如“下江人”这一概念,由于大批长江下游民众的西迁,被大大强化。迁徙到内地后,人生地不熟的“下江人”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社会网络资源,不得不利用自己带来的一点儿本钱摆摊、开店、做小买卖,维持生计。颠沛流离的路途、很难看到希望的战争、陌生无所依靠的环境等诸多因素,给这些迁徙人口心理带来了怎样

的冲击,值得好好探究。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流动,且是在战争紧张环境下的流动,其间一定有着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太少。

二是灾荒和被难史。根据相关研究,从自然变迁的角度看,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的周期性波动过程中,中日全面交战的1937年至1945年,是自20年代至30年代中叶灾害群发生之后出现的一个相对平静期<sup>⑥</sup>。但是,战争环境大大提升了灾荒发生的可能和为害程度。比如因为战争导致的黄河决口和人为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造成数百万流离失所的灾民。这些灾民一瞬间被抛进灾难之中,不得不承受战争直接带来的家破人亡,整个的生活和命运都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走向。这些灾民的生存、生活和心灵史很值得书写。包括那些默默在灾难中死去的灾民,如果有心人能从中打捞出一些早已沉没的故事,既是这些死难者的幸运,也是历史学的幸运。

抗战时期,除了黄河改道、1942年至1943年河南大旱及稍后广东大旱这些大规模灾害外,还有个人在战争中的被难史。比如日本人的轰炸和烧杀常常造成家庭和个人命运的巨大变换,一场轰炸下来,很多家庭的生存物资损失殆尽,丧失维持最基本生存的能力,命运出现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由此走上沦落的不归路。很多人由于战争打乱了原有的人生行程,兵荒马乱之中,只能选择苟活。这些沦落者由于没有能力在历史上发声,历史研究者甚至很难注意到他们,遑论为之发声。倒是个别由灾难中走出的成功者,他们的励志讲述不断验证着“苦难是成功的垫脚石”的名言,让人忽略了更多被苦难吞噬的默默无声者。历史研究者注意这些被吞噬的小人物,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控诉,而是要看到灾难的无情和残酷,看到在这之下辗转无助小人物的命运。

三是民众负担史。抗战是全民族战争,又是以弱对强的战争。为了抵抗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全国民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包括担负对日抵抗的人力与物力支持。日本优势的战力造成中国军队的大量伤亡,仅1937年7月到12月不足半年时间里,中国军队人员损失即达447114人<sup>⑦</sup>。巨大的消耗,使得中国方面不得不依靠过度的人力动员维持战争,后方向前线输出数以千万计的壮丁。整个抗战期间,全国

征募兵员达到13922859人,补入部队人数12232973人<sup>⑧</sup>。而前现代的组织、社会及执政党控制社会的企图和能力之间的差距,又使中国很难有效实现社会动员,征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乱象,民众是直接的受害者,他们的付出以及其间的苦难和挣扎,不应该被后人忘记。

抗战的物力消耗也非常巨大。山东根据地1940年有个报告说到战斗的开支:“平均战士每半年打子弹20粒,价洋15元;手榴弹平均战士每半年打8个,价洋12元,其他每人半年临时费洋1元,每年每个战士开支约129元左右。”与此同时,“党政机关人员每人每月4.5元,学校(抗大)每人每月6.25元”。<sup>⑨</sup>可以看出,一个战士每半年如果打子弹20粒、手榴弹8个,花费27元,正好相当于一个党政机关人员半年的开支。而20粒子弹、8个手榴弹的战斗消耗,几乎是最低限度。战争打的是钱,而这些钱最后都要由老百姓来负担,中国的百姓可以说是匍匐在生死线上,支撑日本强加的这场战争。

四是女性史。女性在迄今为止的社会生活中,通常还是弱势群体,历史书写也如是。女性历史的书写要远远晚于男性,通常只是伟大男性身边的美艳陪衬。占据人类一半比例的如此之大的群体,却在历史中几乎失声,这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诚如英国女作家罗莎琳德·迈尔斯所说:“女性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象征千千万万个被压制的声音。恢复女性在历史中的位置绝非易事,任何女性史因此都必须留心空白、遗漏及似是而非的论调。它必须倾听静默,让静默发出声来。”<sup>⑩</sup>

女性在历史书写中被“谋杀”,缘于她们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失语的位置。这样的位置,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本身,已经无法改变,但不意味着历史研究者就可以无所作为。作为一场全民族战争,女性的参与不可或缺,而女性的确也空前参与,尤其在中共根据地区域,女性已经获得了和之前大有区别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发声渠道,越来越显现自己的存在。追踪这样的存在,是女性史书写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另外,如迈尔斯所说,女性常常是“最大的受害群”,抗战时期尤其如此。日本人的战争暴行,通常都和对女性的性暴力相关,而战争中的混乱状

态,也使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更为多见。战争中女性遭遇的特殊伤害及其命运,是历史研究者写不尽的话题。

女性在战争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战争导致巨大的变故和伤害,女性在这种时候常常以其特殊的顽强和坚韧的力量,支撑起一个家庭乃至社会。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军队中的看护及无数个普通的职业女性,她们都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和韧性,顽强扛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五是民众观念史。抗战是一场民族生存战争,日本军队对中国领土的侵占以及对整个国民的烧杀抢掠,客观上促进了民众共同体意识的觉醒。经济学家孙冶方说:“要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及其财产的一视同仁地用烧杀掠夺政策,一般人民很少感觉到自己和国家、民族之间有什么利害关系。”<sup>①</sup>可以说,在抗战时期,最值得注意的观念变化就是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无论是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现代新儒学的崛起,都显示了强烈的中国民族意识认同的需要。社会学家陈达注意到,抗战时期昆明一般家庭贴的门联,许多都包含着国家民族的内容,比如“(一)革命完成国家独立,抗战到底民族复兴。(二)万众一体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回争取民族生存。(三)为整个民族求解放,从长期抗战谋复兴。(四)能战始能言和,有国然后有家”<sup>②</sup>。一个本来长期对国家民族和政治无感的人群,这样的变化,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关于抗战时期的民族意识,尽管可以看到许多涉及精英层及概念本身的讨论,针对民众民族意识成长的过程、表现、状态的研究却很缺乏。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到底怎样?民众民族意识如何生成?民族意识和抵抗意识是怎样的关系?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民族意识如何?沦陷区民众在日军统治之下,有着怎样的心灵史?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即便厕身日伪政权下的那些人,也无法完全无视其民族意识的存在。作家王林的日记中写下一个案例,河北河间抗日政权的萧区长被伪公安局局长刘永江包围,弹尽自杀,伪局长知道萧区长在群众中有威信,“叫群众捐钱礼葬,群众捐钱甚多。礼葬时他却也来到坟上,感慨流泪地大哭道:

‘中国都像你萧区长可就好了’”<sup>③</sup>。或许伪局长礼葬萧区长的举动只是收买人心,但他在祭奠萧区长时动用的中国话语,还是显示了“中国”这一概念在当年所具有的影响力,这是研究者不应忽略的。战时民族观念的生成及整个国民意识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课题,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还非常薄弱。

关于战时中国的研究,可以做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呼吁加强对默默无闻的个体的研究,绝不是说大的宏观性研究就可以忽略,更不是说政治、军事的研究无足轻重。实际上,和前者相比,后者仍然是研究的基础。只是说就研究的现状言,前者更为薄弱,更需要众多研究者入手和重视。何况在战争和灾难中,那些弱小的人们最容易被摧毁,也因此造成更多的无法发声者。倾听这些静默的声音,是后人无可回避的责任。我们踩踏了无数遍的基石,有时,正是历史的灵魂所在。

#### 注释:

①[法]马克·布洛赫著,黄艳红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②[美]迈克尔·L·弗雷泽著,胡靖译:《同情的启蒙》,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06页。

③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④许世英:《蒋委员长讲救济难民问题》,《新华日报》1938年5月22日。

⑤《徐永昌日记》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印行,第198页。

⑥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⑦《抗战第一期敌我使用兵力及伤亡人数一览表》,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国防部史政局,1946年印行,“附表第5”。

⑧《抗战八年来兵役行政工作总报告》,兵役部役政月刊社,1945年印行,第46—47页。

⑨《山东工作报告》(1940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页。

⑩[英]罗莎琳德·迈尔斯著,刁筱华译:《女人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⑪孙冶方:《抗战和改善民生》,《孙冶方文集》第3卷,知

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⑫陈达:《现代中国人口·联大琐记》,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5页。

⑬王林:《抗战日记》(1940年10月16日),《王林文集》第5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 抗日战争军事史研究中的问题及可能突破的路径

袁成毅

【作者简介】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21.5.31~37

抗日战争史研究存在两种理解:一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研究,二是仅限于对这场战争本身的研究。前者涉及很宽泛的领域,但凡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均属于研究对象;后者则侧重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属于军事史研究范畴。无论从哪个层面研究抗日战争,学界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亦即战争时期的问题多由战争引起,战争本身无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但从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军事史研究其实最为薄弱:一是抗战军事史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其他领域;二是抗战军事史研究成果的军事史学科属性不够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足,有些方面甚至还很少有人问津。针对这些现象,不少学者在相关论著中呼吁,抗战史学界应更加重视抗战军事史研究。当然,如何加强和深化抗战军事史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仅就当下抗战军事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初步梳理,并就可能实现突破的路径略陈管见。

### 一、正面战场的研究视野有待拓宽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弥补以往正面战场在抗战史叙事中的缺失,学界从不同层面持续开展了正面战场军事史料的整理工作<sup>①</sup>。同时,台湾地区战后编纂的各类战史资料也得到较多利用。此外,随着民国档案的刊布与开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正面战场军事史研究受到关注,产出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著。但从深化正面战场研究的角度来看,

研究视野似有进一步拓宽的空间。

(一)正面战场初期作战,战争形态的变化未受到足够关注

在近代世界军事变革的历史上,陆海空三军立体作战早已成为战争常态,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立体作战的战争形态。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由于经济实力等原因,国防建设的重点集中到陆军,海军和空军建设虽也采取了多种举措,但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都严重滞后。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初步奠定了三军协同作战的基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在国民党军队承担作战的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主要兵种是陆军,战史研究突出陆军作用本是应有之义,但国民政府有限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及其作用的发挥,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一时期,现有研究则鲜有对陆海空三军配合作战的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国民党战场战史编纂的分工大有关系。在抗战还在进行的时候,国民政府即开始了战史编纂,陆海空三军各自编纂了本系统战史,其中陆军战史所占比重最大。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军界的陈诚、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所著战史也主要是叙述陆军作战经过,对海军和空军的作战只是简单提及。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其“陆军”“海军”“空军”以及“地面防空部队”仍然由本系统独立编纂相关战史。“三军”史料相互独立的呈现形式直接影响到战史研究,无论是战时还是在战后,学界对陆海空军抗战的研究,很自然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的体系,其中陆军地面作战成为战史叙事的主体,海军、空军抗战史事只体现在专门研究海军和空军的相关论著中,而在全景式抗战军事史著述中,很少看到对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整体考察。

以1937年淞沪会战为例,关于地面部队的作战已研究得相当深入和细致,海军和空军在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却未得到显现。就海军而言,虽然未在沿海与日本海军展开大规模正面作战,主要是在长江口将大量军舰和民用船只沉入江底,设置起阻塞线,以此阻挡日本军舰溯长江西上,其中江阴阻塞线使日本海军滞留上海一带近四个月时间,不但打乱了日本海军预定作战计划,而且为国民政府陆海军在长江中游的部署赢得了时间。对1938年武汉会战的

研究,也存在类似情况。南京沦陷前后,国民政府海军沿长江一线构建了层层阻塞线,其中马当阻塞线的阻敌效果尤为突出,迫使日军不得不推迟大举进犯武汉的时间。诚如陈绍宽所言:“马当的阻塞,直把敌人军舰压迫在芜湖方面,达半年之久,其间不知道给我们争取了多少有利时间,来从事保卫大武汉的军事配备,到了二十七年六月,敌人运用陆军力量,向马当采取迂回战略的时候,敌舰才勉强在其陆军护翼下,向我沿江正面海军要塞阵地活动,但没有法子突破,反给我们炮队击伤了几艘军舰,终要等待到它们的陆军施展出很大的兵力,把我们要塞包围,我们奉命放弃了之后,敌人的军舰才慢慢地扫着雷,一步一步挨进来,但我们消耗战和持久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sup>②</sup>

国民政府空军在淞沪会战期间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淞沪会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空军能用于实战的飞机不到300架,基本上全部部署在南京以及周边的南昌、句容、蚌埠、广德、杭州等空军基地。会战爆发后,日军不但动用了在上海地区的全部航空兵力,而且还不断从国内增调航空队来华,作战预案就是在开战数日内完全消灭上述空军基地的国民政府空军。尽管双方实力极为悬殊,但争夺制空权的作战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为之后持久抗战格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由此可见,全面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作战,也是中国初次经历有别于传统战争形态的新式战争。无视战争形态的这一重大变化,就很难对正面战场初期的抵抗作出全面评判。

(二)正面战场中后期作战,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未作打通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主要强调了三个层面的内容:中国战场是对日作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牵制日军,使其无力北上进攻苏联,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中国战场的艰难抵抗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英美等国争取了更多备战时间。如果仅仅从这三个层面理解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起码在军事史层面上是不够的。就东方战场而言,也存在着两个战场:一是中国战场,二是太平洋战场。大体上说,中国战场承担着对日本陆军作战的主要任

务,太平洋战场承担着对日本海军作战的主要任务,两个战场共同构成了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

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虽然在地域上有所分隔,但两个战场密切关联,互为战略支持。而现实的研究情况是,日本方面的战史将在中国战场的作战和在太平洋上的作战,分别称为“中国事变”作战和“大东亚战争”作战,有意割裂了两个战场的关系。实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的抵抗和战局演变,深刻影响着日军对英美开战的时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方面,日军不得不动用相当多的兵力到太平洋战场,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在中国战场的军事布局;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上的作战并非孤立为之,有些战事直接依赖中国战场,有些则间接依赖中国战场。因此,中国抗战军事史理应重视对太平洋战场的研究,重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在军事上的互动关系。但长期以来,学界较少将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作打通研究。

应当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美军与日军在太平洋海面和海岛作战的同时,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军事动向很多与太平洋战场的进展紧密关联。就中日陆军作战而言,1941年12月至次年1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作战目的主要是防止中国军队利用广九铁路策应英军香港作战;1943年11月、12月,日军发动常德会战,目的是牵制中国军队向云南、印度调动,防范中国军队对太平洋战场和印缅战场的策应。1944年5月至12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空前的豫湘桂战役,目的是摧毁设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美军空军基地,打通中国大陆内部以及大陆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交通线。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发生于中国战场的这些战役,研究视野若仅限于中国战场,就很难看到中国军民付出巨大代价的战略意义。以豫湘桂战役为例,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这场战役中国军队失败的一面,但如果将其与太平洋战场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场即使是失败的战役,也仍然发挥了部分牵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的作用。1942年以后的缅甸战役更是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联动的作战,既往研究较多注意到中国方面打通国际援华通道的单向诉求,较少关注美英对中国责任的期望。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是极其重要的作战内容,美军实施这一战略更与中国战场密不可分。美军对日本本土空袭不但凭借了中国战场的基地,而且也让中国承受了日本在中国战场大规模地面作战的代价。1942年4月,美军以中国东南浙赣境内机场作为实施对日本本土空袭的返程基地,在太平洋上实施了“杜利特尔空袭”计划。日军为了中止美军这一作战方式,很快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浙赣战役。1944年,美军欲将B-29轰炸机部署于中国西南地区,由此出动空袭日本本土。当年四川省发动了50多万民众,在成都附近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等地为美军修筑大型机场。<sup>③</sup>国民政府防空部门也在大巴山、米仓山、秦岭、汉水等地布置了防空监视哨,这才有力保障了美国B-29飞机的出击。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报告中曾评价道:“驻华美空军的成果多赖中国防空情报网对敌机作迅确报告,此项情报网竟延伸至敌军占领区内,中国最缺乏最新式之通讯工具,但仍为世界上最快且最有效之情报网。”<sup>④</sup>美军从中国基地出发实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成为此后对日本大规模本土空袭的预演。但现有研究较多地关注到美军在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上频繁出动机群对日本本土的“地毯式轰炸”,而较少关注美国早先从中国大陆实施对日本本土的出击。若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打通研究,自然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 二、敌后游击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待充分展现

敌后游击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对日游击作战的主战场,对敌后战场游击战的研究,最主要的是对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研究。此外,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也在众多地区开展了对日游击作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敌后游击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有待更充分展现。

(一)中共敌后战场游击作战的复杂性展现不足。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也称解放区战场,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就对敌后战场的开辟、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概括,这也成为指导后来研究的重要理

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研究,比较集中的成果是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基本战略方针、敌后战场的形成时间和标志、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及何时成为主战场、敌后战场是否存在战略反攻等较为宏观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指出,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有许多值得研究和需要深化的问题,如日军在敌后战场的战略与政略、敌后战场的政治动员和民众作用、“扫荡”与反“扫荡”战、局部反攻阶段的重要战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装建设问题、民兵组织与民兵作用、敌后游击战与敌后城市关系等<sup>⑤</sup>。但从近些年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看,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还有很多没有受到抗战史学界的关注,即使仅就游击作战的经过而言,目前的研究也主要限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的一些重要战役,如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缺乏对更多经典战役的挖掘;对敌后游击作战形式的研究多偏重敌后军民与日伪军的直接军事对抗,对游击战的多种形式如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河湖地带游击战的共性与差异性缺乏比较研究。此外,对非直接军事对抗形式,如破袭战、信息战、交通战、情报战、“锄奸战”等也缺乏深入探讨。

(二)中共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的战略配合,多以宏观结论代替实证研究。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形成了强有力的战略配合,虽然一些重大的战役由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承担,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民众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开展的游击战,极大地制约了日军的部署与调动。中共领导的每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差不多都起到了对正面战场作战直接或间接的配合。对这种配合的关系,仅限于宏观上的结论或认知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诠释。如抗战初期八路军进入山西后,形成了对进犯山西日军的极大牵制,其中的平型关战役既是八路军对日军的首次作战,也是八路军对第二战区正面战场作战的重要配合,而既往研究往往忽视了后面这层作用。如果能以中共领导的某支武装力量或某个根据地个案,具体探讨其对正面战场的影响,可能会更突出中共敌后游击战的价值和意义。

(三)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研究,存在以省域代替根据地的“碎片化”现象。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主要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而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处于数个省域的交界地带。因此,只有将根据地作为地域单位开展研究,才能真正揭示中共敌后抗战的面貌。但近些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各地不断受到重视或强调,各省区均出版有本省区抗日战争的史志著作,无论是区域史还是地方志,往往有“越境不书”的要求,因此很容易导致将敌后战场的历史“碎片化”地呈现于不同省域的结果,这对深化敌后游击战历史研究非常不利。以华中根据地新四军的研究为例,由于涉及江苏、浙江、安徽等多个省份,各省分别叙述所在省的史事,显然很难揭示新四军华中抗战的整体面相。

(四)中共敌后游击战研究的史料来源不够丰富。档案资料本为战史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但由于目前档案开放较为滞后,研究者基本无法利用。好在战后不同时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编纂了众多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等游击作战的战史资料,加之众多人物的回忆资料等,成为研究敌后战场最主要的史料。由于史料编纂本身具有选择性和局部性,研究者在无法利用档案资料的情况下,只能利用已刊战史资料,从而造成了史料来源的单一,这就很难对游击战这种特殊作战形式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当然,史料运用在客观上存在的困难是,游击战多数是小规模作战,日方大型的战史资料也很少有反映,作战过程多反映在一些联队作战记录或中下层官兵的阵中日记,研究者一般很难利用到这些资料,这就使得作战双方的史料无法得到相互印证,影响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

(五)中共武装力量对日作战与“反顽”作战存在相提并论的现象。从军事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对日作战应成为中共抗战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体现战时中共“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佐证。虽然中共武装力量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武力压制,双方甚至多次发生武装冲突,迫使中共部队不得不在对日作战的同时展开“反顽”作战,但对日作战与“反顽”作战性质有别,若将其相提并论,无疑会淡化中共武装力量在对

日作战中的巨大历史贡献。

(六)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兼顾不周。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战主要有两方面的力量:一是国民党正规军,二是国民党在各地的地方武装。早在淞沪会战结束后,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部分国民政府军就在苏浙皖边区开始了游击作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正面战场战事的减少,国民党正规军多在敌后开展对日游击,学界对国民党正规军的游击战已有较多探讨。相对而言,对国民党在敌后游击战的另一方面力量——地方武装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如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十分重视游击战,他认为“必须将游击战与正规战互相配合,巧为运用,然后方可以发挥其本身之最大效能,以收克敌制胜之效果”<sup>⑥</sup>。基于这种认识,浙江省战时组建的国民抗敌自卫团,在对日游击作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他各省也有类似地方武装,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研究似有重视这些武装的必要。

### 三、抗战军事领域一些薄弱环节有待加强

军事史是一个涉及内容十分广泛的学科领域,它包括军队统帅部及各战区的指挥运作、战略方针和部署、战术运用、军队状况、军事训练、政治工作与动员、作战能力、后勤保障、战区与后方关系、军政关系、党政军民关系、军事动员、供给支援、军种协调、战区配合等等<sup>⑦</sup>。以上这些方面当然是军事史研究的基本内容,除此之外,还有涉及抗战军事史的诸多领域,值得深入探讨。

(一)“敌情研判”与决策机制。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方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都有过研判。同样,日本方面也对中方可能采取的抵抗作过预判。中日双方都是在互相研判的基础上,通过各自不同的决策机制形成作战方案。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作战双方都十分重视对对方的研判,并根据研判的结果谋划下一步军事行动。既有研究对战前中日双方的互相研判和决策较为关注,对战争过程中的相互研判与决策则关注不够。近年来,随着《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的出版,为研究日本方面的研判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同时,蒋介石档案、日记以及战时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回忆录和日记的广泛利用,为研究国民党方面的研判

和决策也提供了便利。此外,借助诸如战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编《敌情研究》以及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整理的“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等资料集,有关国共双方的“敌情研判”也有望产出新的研究成果。

(二)战前国防建设。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即启动了应对日本侵略的国防建设。江海防方面,主要是对沿海的虎门、厦门、镇海、江阴等要塞进行了整理;空防方面,重点是通过组建航空学校和防空学校,培养了急需的航空防空专业人才。对于这些建设内容,学界有比较多的探讨。相对而言,国民政府战前投入最大的是陆上国防工事,1935年国民政府军方在制定《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时,将全国不同省份分别划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sup>⑧</sup>。国民政府军方认为,京、沪一带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基于这一判断,国民政府开始了“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的陆地国防工事建设<sup>⑨</sup>。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已完成的国防工事主要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地区。由于国防工事属于机密工程,除档案资料外,一般很难利用其他文献开展研究,相关的研究因此还不够充分。此外,对于战前国防工事中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也缺乏实证性的研究成果。

(三)国防地理与作战地域分布。中国国防地理的态势决定了日本对华发动战争的区域格局,抗战军事史的研究必须关注中国抗战的国防地理或军事地理。早在全面抗战前,学界和军政界就有许多讨论,如何应钦、蒋百里等都有关于中国国防地理的探讨。战时以胡焕庸为代表的学者更是就中国国防地理形势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但战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十分薄弱。事实上,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加以解读的。一是日军占领区。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方面对占领中国哪些地区是有明确主张的,但随着战局演变,不得不作出调整,如对于华南,早在1935年的日军作战预案中就提出占领福州、厦门,如需要还可占领汕头<sup>⑩</sup>。但由于华北和华东战事的胶着,日军推迟了好几年才占领这些地区。因此,关注作战的地域问题,有助于解释日军不同阶段的作战意图。二是作战地域上呈现的

特点。中日开战初期的作战主要集中于平汉、平绥、津浦、沪杭、京沪等重要铁路干线,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的张嘉璈就将抗战初期的作战称为“铁路线争夺战时期”<sup>⑪</sup>,美国学者萧邦齐也称抗战初期中日正面战场的作战为围绕铁路线的“交通战”<sup>⑫</sup>。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西南地区联结印支半岛国家的重要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桂越铁路线等也成为交战焦点。因此,聚焦重要交通干线的作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现代战争与传统战争的区别。三是国民政府战区划分与战场格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不同战区,各个战区在不同阶段承担不同任务,有时是主战区域,有时是游击区域,且各个战区的作战效果相差悬殊,以战区为“单位”的军事史研究目前还比较少。

(四)典型战役的进一步挖掘。聚焦正面战场的22次会战和敌后战场的主要战役固然重要,但在战争的特殊时期,有些战役虽取得胜利,但关联的作战还未结束,出于减少敌方注意的目的,这些战役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如在1938年春徐州会战期间,各方注意力都集中到津浦路北段,而第三战区作战部队在江南作战取得的胜利就很少为人所知,特别是在安徽广德县流洞桥附近的作战,规模很大,战绩明显<sup>⑬</sup>。战时就有人指出,在津浦路北段,“我们对敌军歼灭战略的成功,已经为全国民众普遍知悉,但是江南敌军对于我们歼灭战略的惨败,则因为种种缘故,还未为各地深刻认识”<sup>⑭</sup>。因此,除了对重大战役作继续深入的研究外,还应当进一步挖掘一些在作战手段、作战效果等方面具有独特性的战役战斗。此外,作为现代战争,自己部队的误伤现象或事故同样值得研究,这在陆战、海战、空战中均有典型事件发生,对于这些问题似有关注的必要。

(五)战绩评价的问题意识。在抗战军事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一场战役中双方兵力投入、灭敌人数、自己人员伤亡作为重要议题,由此证明作战是否惨烈、战略是否正确等,这已成为军事史研究中最常见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就一些小规模的作战而言,中日双方投入的兵力本身并不多,是否有必要弄清这些数据,很值得反思。如1938年2月,苏浙皖边的国民政府军第59师在浙江孝丰、安吉一带多次与

日军展开作战,该师战斗详报称日军伤亡人数400人至500人<sup>⑤</sup>,显然数字有所夸大。由于我们无法从日方战报中完整地了解到这些作战的情况,若要花费很大精力考订这个数字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一类小规模作战,可能还需要在既往研究中提炼出新的问题意识。

(六)兵役制度的实施与武器装备等。兵役制度是国家重要的军事制度,国民政府《兵役法》的制定与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多层面的兵役行政体制和国民兵役制度以及兵役制度的实施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兵员的征募,从征兵开始到正式进到部队,涉及地方政府和军事单位多个方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可从制度史层面着手,更需通过个案研究展示历史的复杂面相。此外,武器装备也是军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国民政府军还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武器装备普遍存在水平低、重武器短缺的现象,解决的途径主要靠扩大制造、缴获敌方武装、争取外国援助等。对于这几种方式的研究,自制武器的问题和外国援助的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关于国共军队缴获日军武器的个案实证性研究还很少。事实上,缴获武器的状况很能够反映作战的真实面相。据1944年叶剑英的介绍,仅八路军和新四军截至当年5月,即缴获日伪军的长短枪分别达18.9万支和12.4万支<sup>⑩</sup>。如果对此数据加以细化研究,能说明很多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抗战军事史在诸多领域还存在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期待学界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共同推动和深化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

#### 注释:

①关于军事史料整理与利用问题,可参见笔者《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整理与利用》(《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一文,此处不再展开。

②陈绍宽:《三年来海军抗战工作之检讨及今后发展之方针》,海军司令部编译处编:《海军抗战事迹》,1941年印行,第26页。

③《蒋委员长电勉川临参会:川省同胞肩负抗战重荷,最近修筑机场贡献尤伟》,《大公报》1944年6月18日。

④黄镇球:《防空在今后国防上的新估计》,《河南省政府公报》1945年第4期。

⑤杨圣清:《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研究述评》,杨青、王旸编:《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1995-200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

⑥黄绍竑:《游击战之理论与实际》,金华《浙江潮》1938年第14期。

⑦曾景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杨青、王旸编:《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1995-2004)》,第262页。

⑧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2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1—362页。

⑨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时期军事报告》(“民国丛书”第二编32),上海书店(据1948年版影印),第6页。

⑩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0页。

⑪张嘉璈著,杨湘年译:《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35页。

⑫R. Keith Schoppa, *Revolution and Its Past*, Upper Pearson Education Inc. Saddle River, NJ07458, P. 258.

⑬《流洞桥附近歼灭战》(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七八七-6538。

⑭王叔明编:《抗战第一年》(上),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187页。

⑮《第五十九师孝丰、安吉各役战斗详报》(1938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七八七-8397。

⑯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17—618页。

## 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关怀与路向

吴敏超

【作者简介】吴敏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21.5.37~41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进入21世纪,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和资料整理都取得了长足进步。2019年1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综合反映了国内抗战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当然,这亦是一个新的起点,研究者仍然需要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资料搜集与出版、研究方法

角创新上不懈努力,寻找新的学术兴奋点和增长点。面对极大丰富的档案资料的开放和种类繁多的数据库的建成,研究者在绝大部分专题上不再感叹无米下炊,而是更多地思考如何在披沙拣金和抽丝剥茧的过程中提炼问题意识,凝聚学术智慧,将抗战史研究推进至更高水平。而进一步推动区域抗战史研究,应该是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取向。

首先,对“区域抗战史”概念的提出略作阐发。区域抗战史的两个关键词是“区域”和“抗战”,后者比较明确,即14年中国抗日战争。前者的定义和范围可以探讨,笔者倾向于将“区域”理解为拥有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元。根据讨论抗战时期问题层面和关注焦点的不同,可以是诸如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较大范围,也可以是诸如杭嘉湖平原、大别山区、苏北地区或者珠江三角洲等较小范围,甚至是更小的区域。无论范围大小,可以确定的是该区域在抗战过程中共享了一些同质性要素,如客观存在的山川地理、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区、相似的民风民俗,以及战时特有的军事战区划分(如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或新四军活动区域)、政治统治力量(如汪伪政权统治区域)等。

实际上,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已有相当积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习惯将抗战时期的中国大致分为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对这些区域(更多是对区域中的区域)抗战的研究,构成了以往区域抗战史的主干,并呈现越来越深入的趋势。具体而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通过发动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等战役,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广大平原地区。但中国人民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保有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不断开辟根据地。战时中国逐渐形成了沦陷区、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三分天下,相应的区域抗战史研究也应运而生。

当然,未来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可以超越既有的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三分法。跨越不同统治区域的区域史研究,将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深入历史的肌理,观察战时中国。实际上,随着战事发展和形势演变,所谓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的范围

与边界在不断变化,有的连成一片,也有的分散各处。很多拉锯区域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形。以往关注的国统区,多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其实,国民政府西撤时,在东部地区留置相当兵力,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均有一些国民党统治区域,况且在抗战前期和中期,相关区域范围并不小。中共领导的区域包括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因此,当研究者聚焦于华北、华东和华南时,发现这里既有沦陷区,也有国统区,还有不断发展壮大的抗日根据地,各种力量之间的军事斗争与政治博弈,展现了抗日战争历史的错综复杂和丰富内涵,这也是抗战历史研究最具魅力的地方之一。正因为抗战时期特定区域内活跃着多种政治力量并处于极大变动的情形中,且与相邻地区存在一定区隔,具有相对独立性,区域抗战史由此成为颇有意义的学术视角。

以华东地区为例,日军占领了平原地区的大多数城市,控制重要交通线,以往习惯称之为沦陷区,1940年开始主要由汪伪政府统治。不过,国民政府西撤时留下部分军政力量,浙江、江苏和安徽等地的省政府依然在各省境内坚持领导抗战。浙江省政府在省会杭州被占领后,迁至金华永康办公,继续维持对浙东的统治并统领浙江抗战。江苏省政府流亡至长江以北的扬州、淮阴。韩德勤于1939年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在兴化地区勉力维持。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在战时属于桂系领导的第五战区,先后由李宗仁、廖磊和李品仙担任省政府主席,依托大别山区坚持抗战。浙江、江苏和安徽等省政府的存在,对日军和汪伪政府的政治统治构成威胁,对省内沦陷区的经营也未停止。另外,由顾祝同担任司令的国民政府第三战区下辖浙江、江苏、福建和安徽等省,司令部先后驻节皖南屯溪、江西铅山,领导第三战区的军事作战。综上,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依然在华东的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山区、丘陵、盆地继续维持统治。

更重要的是,抗战时期新四军在华东地区获得很大发展。1938年春,皖南新四军作出向苏浙皖广大敌后地区发展的决定。4月,在国民政府第三战区

的要求下,粟裕组建新四军先遣队,开赴苏南沦陷区。而新四军开赴日军已经占领的敌后地区进行抗日斗争,高度符合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首要目标。1939年,陈毅和粟裕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至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在华东地区获得有力发展,建立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江、四明山等根据地,对于日伪军在华东地区的统治构成极大挑战。

可见,华东既有沦陷区,也有根据地、国统区;既有正面战场的正规军大兵团作战,又有敌后战场的小规模游击战。日本对华东地区的占领既不广阔,也不深入。如果将目光锁定在华东的一个省甚至省内更小的区域,类似情况亦存在(华北、华南地区也是如此)。如苏南地区,淞沪会战后即成为沦陷区,后来是汪伪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不过,国民政府在苏浙皖边区设立江南行署,在江苏宜兴、溧阳一带与日军作战,戴笠指挥的“忠义救国军”亦长期在苏南活动。新四军则在茅山地区建立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并向东发展。日伪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在这一区域内博弈多年,狭路相逢勇者胜,正是在三方势力的比较研究中,映衬出新四军在反“清乡”等艰苦斗争中展现的韧性和灵活性<sup>①</sup>。由此可见,区域抗战史视角的引入,有助于超越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等既有划分,呈现抗战时期华北、华东、华南等区域及区域内部各种力量发展和斗争的复杂性、丰富性。

其次,区域抗战史视角可帮助研究者深入考察抗日战争对于基层社会和普通人民产生的影响,观察地方社会在战争中如何应对变乱、重建秩序。日本侵华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改变了各地的乡村组织、经济运行、动员方式、日常生活、精神面貌,以上各方面往往要落到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语境中,才能进行细致入微的探讨,从而看到更多的起伏不定与必然中的偶然。

以往的抗战史研究,较多关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役战斗、战时国共关系、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等,即侧重于政治、军事和外交层面,取得相当成就。不过,对基层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或者只关注社会、经济中的某

个面相,忽略与其他方面的相关性与联动性。即使涉及相关性与联动性,处理时也相对简单。区域抗战史理路在研究战时区域军政变动的同时,力图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研究,既反映战时地方社会经历的关键军政事件,又呈现地方社会的一般面貌,既关注历史大河的波涛滚滚,又注意静水深流,贯通事件发生的台前与幕后,顾此及彼,将地方社会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因此,开展区域抗战史研究应着力于整体性,而非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教育、文化诸方面的单一面相,这也是区域抗战史研究能否深入推进、展现学术价值的关键所在。将战时中国分成一个个区域来研究,不在于将研究区域划分得越来越小,降低研究难度,而在于求得一个深入的分析与解释。研究问题的入手处或许还是税收、军粮、兵源等一个个具体问题和事物,但观察与讨论的取径必是环环相扣、交织往复、渐入肌理,最终直面需要理解和深化的大问题,真正能“以小见大”,透过事件观察制度运行,从具体现象中发现普遍与深层的东西。所以,如何选取一个有可挖掘性、拓展性的具体研究对象,以及如何将这一具体对象层层展开,娓娓道来,知人论世,便成为深入研究和引起共鸣的锁钥所在。在考察地方军政巨变的同时,研究者还要充分观照区域的历史与过往的传统,与区域内的山川地理、自然禀赋、民风民俗、底层势力、宗教信仰等要素不断进行对话,发现地方社会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探讨这种结构与机制在战乱时代的因应、变动和影响。概而言之,抗日战争究竟给这一区域的历史进程带来了哪些剧烈和缓慢的改变抑或似变非变之处。

所以,区域抗战史研究是要将抗战变局放在该区域的长程历史中观察,以便更清晰准确地把握抗日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旷日持久,波及范围相当大。但相对于10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来说,14年并不算长。如果再将抗战放到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更只是一瞬间。因此,有必要追问抗日战争在国共较量中、在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在中外竞争与互动进程中所扮演的作用。而这些作用,或许落到一个区域,在一个长时段的参照之下,可以得到具

体而微、恰如其分的呈现。

当然,抗战在给中国带来巨变的同时,也映衬出某种不变的底色,有的关乎资源与环境,有的关乎生产与生活方式,有的关乎城乡关系,有的关乎人性与传统,这些也会在区域抗战史重视基层、关怀整体、面向长时段的取向中得以展现,从变中观常,在常中观变。

再次,区域抗战史研究有助于认识战时各地之间的差异性。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经历了14年沦陷岁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相对统一的局面被战争分割,区域内的秩序经历了被破坏与重构的过程,区域之间的往来突然减少,区域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凸显。国民政府将中国划分为若干战区,这些战区往往跨越省份,不同战区的作战任务、频次和成效不同。中国共产党指挥八路军越过黄河、东进抗日,活跃在华北大地上;新四军在皖南集结,后在江淮大地建立若干根据地。日军占领东部大片领土后,在各地扶植伪政权,其中汪伪政权的统治范围相对较大、统治力度较强,其他很多伪政权开展的工作较为有限。上海、天津等城市虽然被日军占领,但租界依然维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因此,不同区域的国共两党抗日、国共关系、伪政权统治、基层社会与经济情况等都呈现不同的样态。在国民政府统治重心由东部向西南转移的过程中,对西部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影响。国民政府提出“西南是抗战后方、西北是建国后方”的口号,开发西北声浪滚滚。西南和西北地区在抗战时期经历了重大变化,如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地区,包括边疆族群凝聚、新疆“内向”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都值得重新考察。

区域抗战史视角有利于提炼各个区域的主要议题、社会特征、内在变迁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开展区域间的多维度比较和思考,进而认识战时中国的斑斓画面。也只有在充分理解差异性和努力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对全国抗战产生更为真切和高屋建瓴的把握。从这一角度言,推动抗战史研究真正“落地”,尚有许多扎实、具体、细致的工作需要耐心去做。

最后,关于区域抗战史研究可能的取径和书写

方式,笔者尝试提出以下三方面思考和展望。

其一,区域抗战史应重视对人的研究,包括对历史重要人物和普通人命运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的心理、情感与思想变化的研究。当战争突然发生时,危险和苦难骤然降临,无数人的生命在炮火中灰飞烟灭,活下来的人们所思所想以及所做的选择,都值得记录和研究。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前线面临战事,后方遭受轰炸,在长期的战乱环境和困难局势中,每个人的生存随时随地可能受到威胁,忧虑、恐惧和亲人间的生离死别伴随着大多数人,而苦难更能考验人的智慧、磨炼人的品格。相较于平时,战时的人们处于变动不居的环境中,可能需要作出更多更重大的选择,有些选择经过了深思熟虑,有些选择是匆忙之间不得已为之的当机立断,也有些人的选择是人云亦云或者默默维持现状,这些都关系到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很多人的选择汇聚到一起,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走向。

落实到一个具体区域中,一旦原来居住的城市和村庄被占领,国民政府统治土崩瓦解,是选择走,还是选择留?选择走的,是到近处山地、乡村暂时避难,等战火过后回到故园,还是远走大后方?如果去大后方,川资如何筹集,路上行程如何安排,到大后方后以何为生?<sup>②</sup>留下来的,是选择与日伪政权合作、隐忍还是反抗?<sup>③</sup>合作亦有积极合作和消极配合之分,还有从合作到反抗或者从反抗到合作的转变。人们选择反抗日伪统治时,是自己拉起一个队伍,还是参加国民党军游击队,或者投身八路军、新四军?在敌我反复拉锯的区域,或者在表面由日伪控制、实际中共力量已产生很深影响的地方(如敌后抗日游击区),普通民众如何做到“白皮红心”,既保护自己,又在暗中全力支援中共的抗日活动?在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的战时岁月里,很多缺少成年男子支撑的普通家庭如何艰难度日?研究者需要根据当地当时的情景,切实展现与细心揣摩人物在战火中的处境、心理、选择、行动,体察他们的处事原则与内心理想的坚守或放弃,这其中蕴含了人们求得生存、保护弱者、苦撑待变的本能与本性,也有不齿和唾弃汉奸的纯朴情感。人们在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跨越千里,目睹日军侵略、日伪统治、抗日行动,自然而

然地将个体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进一步重构了对于家国的责任、想象与认同。

其二,区域抗战史的书写,应克服宏大空疏的叙事方式,带领读者重回战争年代的历史现场,体会鲜活的时代氛围和复杂的人心人性,兼顾主流、支流与潜流以及高音与低音,觉知铁板一块中的裂痕与缝隙以及既定认识在历史进程中的不确定性。抗日战争史在社会上拥有数量众多的爱好者,以抗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经久不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抗战战争的持续关注与热情。区域抗战史深入地方社会、关注人物命运的取向,拉近了过往历史与当今读者的距离。有些具体鲜活的抗战历史场景与经验,或能唤起读者记忆中“我家爷爷奶奶也这么说过”“我们老家就是这样”的强烈共鸣。如能实现或初步推动抗战史事与山川地理空间、区域社会民风民俗与诸多历史人物的有机结合,文字张弛有度,叙事由线、面至立体,论述多维细腻,多一些史实重建和人文关怀,少一些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和史料堆积,那么扎实深入的专业研究亦会亲切可人、受众日多。

历史重大变动时期的史事既能震撼人心又意蕴深远,14年抗战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苦难,也孕育了民族重生的希望。研究者笔力与论见所及,能促使和平年代的人们感受国家民族的来时路远,体会人性深处的弱点与光辉。在悲愤于日军大肆侵略和感动于国人拼死抵抗之余,再多一些追问,反思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和苦难。

其三,区域抗战史研究并非在区域内画地为牢,而是自始至终在全国抗战局势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野中徐徐展开。要做到这一点,非大量阅读、研究和反复思考难以达成。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由各大洲一个个战场组成的。1939年9月欧战爆发、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

争爆发,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卷入大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战场的走向。以浙江为例,1941年宁绍战役的发生,与日本侵扰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并意图南下东南亚有关。1942年浙赣战役的发生,则与日军摧毁浙江衢州的机场,防止美军从衢州机场起飞轰炸日本本土有关。

区域抗战史中的个案研究,是推动抗战史研究的基础,是抗战研究之树的枝杈或绿叶,避免可能的“碎片化”无疑是研究者应牢记于心的。设定区域的初衷是便于研究展开和问题意识的聚焦,而研究的走向与结果则一定会超越区域界限,面向更广阔的学术天地,展现更宏大的学术关怀。从这一层面而言,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深入,生发的影响将是“见微知著”“上下贯通”“左右逢源”,从区域中看到战时社会的关键特征与变化,看到区域与区域之外的国家和世界的连接,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整体推向深入,更好地把握、阐释和理解这场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

#### 注释:

①谭震林在反“清乡”时告诫部下,要像牛皮一样坚韧,“叫敌人吃不进、咬不烂、折不断”,“党支部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不疲倦、不间断的!”参见王征明:《跟随谭震林战斗在苏南敌后》,《铁窗赤子心——王征明诗文选》,2001年印行,第94页。

②骆懋甫在《浮生手记(1886-1954):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描述了全家人逃难时的不同选择和去向。

③美籍学者傅葆石著、张霖译《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详细展现了上海沦陷后文人们的不同选择和生存样态。